



EUROPEAN
SHANGHAI 2010
UNION
欧盟上海



European Union
Regional Policy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执行摘要和报告

2010年10月19日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承办：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欧洲委员会区域政策总司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执行摘要和报告
2010年10月19日



执行摘要

中国和欧盟欣然迎来中国—欧盟区域政策对话暨第五届中国—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对双方而言这都是宝贵的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中国和欧洲的代表认识到，中欧之间虽然存在着文化差异，却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发展的不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公平的分配、以可持续的、环保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主题。

四场主题发言后，围绕区域治理与创新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两大主题分别召开了会议。

浙江“山区”相对于“沿海”地区的落后，以及全球语言语音合成技术领先者讯飞（iFLYTEK）所获取的成功，揭示了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严峻性；即使在相对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差异问题依然突出。伦敦、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法国）（PACA）地区以及巴黎大区的贫困问题则是来自欧盟的与会者提出的关注焦点。与会者达成了一点共识，即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资助并不能解决问题。通过创新的政策机制鼓励知识创新，使创新向最有需要的地区传播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确定区域比较优势并制订长期战略以维持该比较优势，需要结合市场激励措施和有针对性的政策行动。示范区和试点项目往往是第一步，挑战则可能在于如何鼓励创新观念的传播，以达到大规模扩大其影响面的目的。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目前正着眼于以创新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区域管理体系。URBACT（一项推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欧洲交流与学习计划）已经启动了一系列项目，将欧盟从那些具有启发性的一次性城市转型经验所吸取的经验，运用到其他大规模项目中，将其作为主流进行普及和推广。欧盟通过一项充满活力的协商行动计划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通过这种方法企图克服地区发展进程零散、割裂的问题，零散、割裂的现象在官僚作风较重的行业政策或国家政策影响下益发严重。

大部分发言人都表明了集群发展的明显优势。在集群里，拥有各类专门知识和资源的企业和研究机构云集，发展成区域性枢纽，形成“竞合”（coopetition）效应——集群提供了充分竞争的土壤，又不失合作的优势。荷兰南部的北布拉班特省的医疗设备创新；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PACA）地区的电信、可替代能源研究以及创意产业；长江三角洲的环杭州湾产业带；芬兰的农业和生物技术，爱沙尼亚的基因研究和工程；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合肥、芜湖、蚌埠及皖江城市带的可替代能源及其他关键技术领域，均为集群优势之明证。

代表们承认，人口不断往城市集中、城市持续集群化已是无法避免的趋势，但又强调，必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的人性化城市空间。在长江三角洲，环境严重恶化，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综合使用能力薄弱，加剧了土地短缺的问题。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对江苏省各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年度评估，有助于确定新政策的目标。对于巴黎大区而言，如何为市民提供公平分配的、既环保又经济的住房，确实是当今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URBACT则发起了一系列项目，致力于更好的交通管理、废弃地改建再利用以及欧洲城市的社会融合。

全球各地城市、地区和国家在面临共同的挑战的同时，要找到适合各自情况的解决方法，这就需要彼此持续合作、学习和交流。欧洲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期待加强在区域治理、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对话。



开幕式

主持: 邹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副司长

欢迎辞: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

上海世博会是首届在发展中国家主办的世博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 中国从经济机体的重组到生活水平改善等各个方面的投资, 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央政府特别重视中国西部和中部的区域发展, 东部地区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一方面继续自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投资。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目的是要提升其产业竞争力, 保持其作为一个重要港口的地位, 并成为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中心。作为本地区的龙头城市, 上海已经和其他四个经济中心建立起一个区域发展合作机制, 目前正携手合作于十个成功的项目。

欧盟和中国都有绿色发展、低碳城市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承诺。上海有一个三年行动计划, 但怎样更好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仍然是制约上海发展的重大瓶颈。

欧盟通过帮助建立一个协调区域发展的多层次机构框架, 对上海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要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2003年开始的中欧对话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主题发言：
范恒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

今年是中国—欧盟正式开展区域政策合作的第五年。中国成为GDP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过去五年里，推出了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战略的关注重点是：

□ 以芜湖城市带为代表的关关键先富区域以及江西和武汉等新的增长区域，通过加速发展产生涓滴效应。

□ 经济薄弱地区则采取改革战略，优化区域布局——缩小与北部、南部和东部的差距。2007年，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了东部地区。

□ 基于市场体系的经济一体化加速。这包括确定某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并鼓励该地区发挥其自身的特长，服务于国家利益。对西藏、玉树、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关键功能区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就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十二五”计划中列出的新的发展框架将尽量克服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差距。在环境保护问题严峻的背景下，资源的使用是关注的重点。每个地区都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但地区之间各自为政和激烈竞争仍然是一个问题。要促进机构改革，一项优先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而通过完善的区域政策制度让各个地区充分利用其竞争优势同样也是必要的。范恒山充满信心地表示，“十二五”计划将实现真正的地区平衡。

“十一五”计划期间所取得的进展包括以中国为背景的实验以及向欧盟的学习。在整个“十二五”计划中，中国将继续向欧盟学习最佳实践，所以必须深化研究和交流。这就意味着：

□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合作和整合，打破贸易与投资壁垒，鼓励资源的自由流动，并鼓励在不同的全球经济区域里发展不同的专业方向。

□ 根据不同地区由市场决定的各种比较优势进行劳动分工，以避免激烈的竞争，并形成互补关系。

□ 通过财政转移为落后地区提供基本公平和公正的服务。

□ 通过减少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在人口众多和生态空间之间达到和谐，同时继续培育经济的发展。

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加快的城市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避免西方面临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的问题？

主题发言：
HUBERT GAMBS, 欧洲委员会Hahn委员的幕僚长

欧洲和中国有文化的差异，但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两个地区需要的战略都以促进区域繁荣以避免区域差距为目标。确保我们的地区取得优化的经济发展既具有合理的政治意义，也符合社会正义。对于这些问题，双方各有明智的见解；Gambs先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深化对话。

区域政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欧盟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划拨了3500亿欧元经费，用于制订一项以开放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加强区域经济是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欧盟团结的关键诱因。支持经济薄弱地区的做法，不仅能加强各个区域的经济，并且能增强欧盟的凝聚力和欧洲的整体竞争力。

支持经济薄弱地区全面参与自由市场的意义，并非单纯只是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或财政拨款的问题。研究表明，西德对东德的支持事实上回过头来让西德获益。欧盟在波兰花费的每一欧元，给十五个欧盟成员国带来了平均每国4—6欧分的回报。欧盟正在投资于基础设施、研发、创新、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投入市场的技能的发展，驱动着眼于未来的现代的增长政策。

欧盟—中国交流已经带来了许多良好的结果，包括一项比较研究、谅解备忘录增编、中国国家发改委代表到英格兰东部的访问（这是参与区域政策和发展政策应对挑战的实践机会）等。这增进了相互的理解。现在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个更广泛的长期参与框架，包括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访问。一项对中国区域改革体系的新研究已经启动。

如果我们延续过去的思维——即当初问题产生时所采用的思维——来思考今日的问题，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我们在考虑今日的问题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欧盟成员国的创新绩效在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八十六个人口总数达1.23亿人的地区，其创新绩效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四个新的欧盟成员国生产了全世界33%的粮食。这些低绩效指标是对社会凝聚力的风险，因此，欧盟高度重视通过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提高所有地区的创新绩效。

□ 创新不能被指导，只能被创造。这就要求有可用的融资、地理位置恰当的创造型人力资源、利于创新的市场、企业家精神、与其他创新参与者的互动（包括相互竞争的公司、供应商以及例如设计师和服务供应商等不同行业的公司）、地理相邻性、允许产生新观念的法律制度、研究基础设施（包括新形式的大学合作关系）以及与其他行业政策一致的创新政策。

□ 欧盟的座右铭“在多样性中统一”也具有战略迫切性。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天然的地理、历史价值链，这种价值链可为区域提供比较优势。欧盟希望通过识别成功机会最大的活动为其发展制订战略构想，来制订明智的地区专业化战略。

□ 欧盟的凝聚政策加强了这样一个观念：个别单独行动的国家所达到的效率明显低于互相合作的国家，因为通过合作可以寻找新的机遇、避免知识流动的分散。

主题发言
LAMBERT VAN
NISTELROOIJ,
欧盟议会议员

Van Nistelrooij先生在区域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让他在过去五年里得以连任欧盟议会议员。如果你有一个贴近人们、生活、工作和上学的全面的地区政策，那么你就能触动人们的心。

创新对于良好的区域政策而言至关重要。它

- 应当适用于所有地区，不论是富裕或贫困的地区。
- 要有具体的地理范围。这是一个如何拉近距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研究的问题，研究固然创造知识，但是如果不附着于特定的地理区域，知识只能自由浮动，知识需要着陆于区域具体的某个地方以创造就业。
- 不同地区明智地朝不同的专业方向发展，推动创新。
- 基于欧洲座右铭“在多样性中统一”，必须坚持跨境、跨区域和区域内的合作。

Van Nistelrooij先生欢迎中国—欧盟的区域政策对话，并强调了对话的价值，但他也强调，对于区域政策如何做到集中统一、去本土化，有必要进行协调一致的联合研究。

Van Nistelrooij先生的区域政策专长来自于对布鲁塞尔以北150—200公里的北布拉班特省 (North Brabant) 的发展的长期积累。直到20世纪40年代埃因霍温 (Eindhoven) 的飞利浦等公司发展起来之前，北布拉班特省与富裕的北部相比一直是十分落后的地区。然而，北布拉班特省发展的轨迹成了从一个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经济向创新和知识型经济成功转型的例证。埃因霍温市在政治和地理位置上属于荷兰，但在功能上通过比利时的鲁汶和德国的亚琛而与德国和比利时相结合，形成了埃因霍温—鲁汶—亚琛三角区，这也是对该地区的未来更贴切的称谓。

20世纪90年代，飞利浦和汽车工业面临着失业危机。欧盟和欧盟成员国通过共同融资投入了资金，在经济重组方面提供了协助，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触动了人们的内心。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过后，飞利浦将其关闭了的实验室变成了在埃因霍温的开放式创新校园，并在那里开发出了新的医院用医疗设备。过去十年，大约有一百家其他公司在那里成立，分享并开发新的思维方式。荷兰也因此得以转变，尽管其主要的港口仍然在鹿特丹，但其大脑的港口则位于南部，并与德国和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共享。

凝聚政策的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复制这样的成功故事。由264名代表选出的Van Nistelrooij先生在关于凝聚政策的辩论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他主张将80%的资金投入贫困地区，作为一项特殊的基金帮助贫困地区创新，并主张设立一项预算以推动跨境、跨区域的合作。

荷兰西部的园艺业是凝聚政策的一个成功创新典范。20世纪70年代，荷兰西部的园艺业凭借其温室栽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荷兰的园艺业者担心西班牙、希腊和东方国家进入市场后会带来竞争，因为这些国家具备更有利于园艺业的气候环境，而且不必依赖于温室。但当那些国家真正进入市场的时候，荷兰通过不断创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坚持优质生产，通过从土壤中获取能源而发现了一项补充收入。现在，很多农民从能源出口中赚取了比农作物更多的收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向温室注入了纯二氧化碳以帮助植物的生长。这是整合体系价值的完美典范。竞争帮助荷兰创新，并成为竞争中的佼佼者。

前瞻性备注：

- 注意Nistelrooij先生发表的两份报告（已派发），论述了有关欧盟下一个七年计划（2014—2020）的有关问题。

如何利用布鲁塞尔划拨的研究经费推动区域政策？报告就如何建立研究校园和投资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提出了建议。

- 新《里斯本条约》在社会凝聚力和区域凝聚力之外提出了地域凝

聚力的概念，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赞同欧洲仅将注意力放在城市、放在都市圈——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地域凝聚力意味着我们接受城市的集中化，但前提是各区域之间需要连通的道路和宽带并且相互合作。这就是我们用于欧洲未来的三个“C”（即集中（concentration）、连通（connection）与合作（cooperation））。

- 在欧洲议会，辩论是完全开放的。我的一些欧洲同事认为区域政策是一个老政策，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服务于未来的政策。有人说我应该为能源、水、交通和社会政策分别设立基金，但我不赞成这样的举措，因为我是属于主张综合区域举措那一派的。采用区域政策意味着建设一个更精明、更环保、更持久、更包容的欧洲。

会议一：区域治理和创新

主持：汤志平,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THIERRY FELLMANN,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 (法国) (PACA)
地区集群式创新与就业处
副主任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法国）地区集群式创新与就业处是一个年轻的机构，它是1982年的贷款所启动的地方分权进程（decentralisation process）的一个部分，是由此所设置的机构，由一系列区域运作部门组成。Fellmann先生负责创新政策、就业、培训以及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商业激励。

这篇论文举例以PACA地区为例，说明了集群制度如何通过创新和国际开放性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PACA地区最初即将其发展政策奠定在集群的广泛发展之上，让中小型企业得以充分利用有利的环境。这意味着一方面要着眼于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抓住市场化的机遇。

如何做到这点？

经济全球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为此，我们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由首席执行官和集群领导组成的代表团目前正在加强与一个专家小组的合作关系，并与其中国同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欧盟2020战略，是关于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智力增长、更环保的可持续增长以及更有效利用资源的竞争力增长、健康的就业以及社会和地域凝聚力的战略。

这个发展模式覆盖了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贸易、科技、环境、设计；纳入服务于大型企业的创新并惠及所有的公司；推动培训研究中心以及风险投资银行和公司的全面普及；提高各个区域制定符合当前形势的对策的能力，该等对策应强调全球和本地之间的联系；符合欧洲2010和2030区域创新战略中的国家和区域政策。

PACA地区有国际开放性和创新的传统。它以其著名的旅游景点——普罗旺斯、阿维尼翁和尼斯——闻名于世；它是美的化身、艺术家的灵感之源：梵高、马蒂斯、毕加索、塞尚的艺术皆诞生于这块土壤；它通过马赛港向世界趋势敞开大门。它也是创新之地，在一些全球性项目中，正在研究和创新领域创造卓越的成长；例如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正在系统地建立一个以集群经济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生态系统，为人力资源、培训和商业技能作投资。

该地区目前正面临一个全球性的危机，这可能会破坏其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稳定、中期投资、社会结构问题以及普遍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回应，PACA在2006年启动了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Pôles Régionaux d'Innov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Solidaire, PRIDES）。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是企业和研究实验室集群，它们制订长期的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项目。集群让经济大规模增长，扩大技能池、提高产品质量、进入新市场，在那里企业可以更充分地竞争或合作。集群制度是应对竞争和合作双重挑战——或者说“竞争”的挑战——的极佳办法。

目前已有二十九个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由来自3600个工商企业的4200名成员组成。区域中心分为三类，分别着重于：

- 信息通信技术（ICT）、新能源、水技术、航空和航天
- 特殊的技术缝隙，包括节能建筑、生物技术、生态技术

□ 传播信息

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鼓励通过联合途径来发展项目，汇集关键的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源），并遵循集群间的整合模式。各个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并不局限于其各自特定行业，而是以绿色能源、电子旅游、电子保健以及节能建筑为界。区域间的合作同样导向国际开放性，有助于为进入主要市场做好准备。例如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项目（ITER）就充当着区域代言人的功能，通过在巴西、墨西哥以及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的成功例子有：

□ 电信解决方案集群汇集了来自微波行业、软件、电子、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和使用软件业的业者。这个集群具备了I&D技术平台和创新中心，发挥着研发工厂的作用。它代表了信息通信技术40%的产出，有500名成员并支持4.1万个就业机会。

□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诞生于我们通过核聚变创造或再造太阳能的梦想。它正在建造一个小比例模型来测试在1亿度的温度下发生原子聚变的技术可能性。这是一个100亿欧元的全球项目，有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数个合作伙伴参与。

□ 以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为工作重点的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的运作基础是，来自电影、数码技术、创意产业和时尚界的十一个集群创新和互助经济发展区域中心之间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其目的是为相关的关键大型活动动员所需的技能，这些活动例如：《马赛普罗旺斯2013年“欧洲文化之都”》、纪念塞尚和梵高一类的大型展览以及以数码创新等为主题的大型节日等。

刘亭,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通过战略性的区域政策——包括建立一个区域管理体系——致力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中央政府已将浙江的区域发展提升到了具备国家战略意义的高度。2008年，区域领导人就建立各层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召开了会议。重大区域合作项目由副省长和副市长予以协调。负责执行工作的下属办事处已经设立。目前，项目已延伸至交通运输、能源、信息技术、环境保护、信贷、社会保障、金融、外交事务以及商业管理等领域。

三大战略目标是长江三角洲建设成为：

- 亚太地区的国际门户
- 全球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中心。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浙江将专注于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包括航运和港口物流；专注于舟山群岛和周边岛屿的加速发展；专注于完善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圈以及浙中地区。

具体项目包括：

- 按照“集群一带一网络”的结构围绕杭州湾建立主要产业带，“集群一带一网络”指先进的制造业集群由一条城市带所连接，并为生态绿网所覆盖。

- 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其中包括宁波台温铁路、台温高速公路以及海岸沿线的先进制造业带。

- 位于海港的海洋产业带，主要从事海产加工、海洋渔业和生态旅游。

- 金华—衢州—丽水高速公路的沿线地带。

共同专注于海洋经济并赋予海岸和岛屿区域战略重要性。浙江的沿海和岛屿区域位处中国“T”字形经济带的中心区，海洋资源丰富。这个区域被划分为“一个中心、四个区域”，包括一个国际物流中心和四个展现改革、和谐发展、清洁能源和现代海洋产业成效的示范区域。

通过《山海协作计划》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山”区位于浙江的西南部，舟山市和沿海区域则属于“海”区。

2005年，二十六个县被确认为欠发达地区，以下几个方面的针对性优惠政策得以制订：

- 财政、建设和社会支持。

- 交通、电力设施、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卫生实践教学以及环境保护。

- 教育和培训，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

- 鼓励人们集中在城市发达地区。

- 发展生态经济，包括绿色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

浙江正在通过以下措施，建立一个创新区域管理体系

加强各县运用从上一级行政系统获得的更多自主权的能力。浙江较其他省份有更多的县，这些县共同生产了受省政府支配的全部GDP的60%，因此，应给与各县更多的自主权，让它们的比较优势得到最佳的发挥。两百个有着各种比较优势的中心镇也获选享受特殊的创新政策，这些政策能让它们充分发挥在本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特别专注于集群的劳动力分工并吸引更多的专业技能，将“块状经济”发展为产业集群。

识别新的产业集群地。

浙江通过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取得了突出的经济增长成果，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是严重的问题。刘亭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关于欧洲处理这些问题的模式和经验的信息。

JAN-HENRIK JOHANSSON,
"全球化世界中的区域"
之波罗的海—亚洲议程项目
(BASAAR (Baltic
Sea—Asia Agenda for
Region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roject)
项目经理

BASAAR项目以亚洲经济扩张如何影响环波罗的海区域为研究的对象。环波罗的海区域不是一个政治或行政区域，而是一个地理区域。这个区域覆盖了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内有四个欧洲首都，人口较少，只有970万人。这个地区是欧洲的创新领先者。

对该区域的长远看法：

第二次大战后，欧洲肩负着重建基础设施、机构、制度和家园的艰巨任务。政策创新正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欧盟自身便是一种创新。决策者们认识到，经济利益是能够以一种无需互相攻击的方式获得。这为欧洲带来了和平，团结凝聚力政策真正起到了作用。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2010年，经济危机重申了我们对福利国家的需要。我们相对较快的复苏表明我们有应对形势的必要工具。

在未来的五十年内，欧洲将会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中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有气候变化、如何更谨慎地利用资源、如何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加强我们对地球自然状况的了解。这些挑战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别：

探索改善生活质量新方式的知识社会

流动性和网络社会

这些就是BASAAR项目的关注重点。

BASAAR是一个合作项目，有十一个环波罗的海（包括赫尔辛基、图尔库、斯德哥尔摩、塔林、里加等地）的地区企业和机构参与，这些地区企业和机构共同致力于分析和了解亚洲发展对该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个影响是巨大的。问题是该做些什么？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该作何准备？

知识社会：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及研究所（EU Joint Research Centre & Institute）的一项关于公民保护和安全的研究表明，斯德哥尔摩和南芬兰省（赫尔辛基）在2010欧洲区域竞争力指标（EU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0）中获得了高分。尽管环波罗的海没有矿产和森林资源之类的大量自然资源储备，但凭借人的技能和创新能力，它成为了在欧洲具有竞争力的地区。

我们如何维持知识社会赋予我们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自1999年以来显著增加。中国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未来二十年内将成为世界领先的研究者。我们将此视为一项挑战，也是一个与中国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机会。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必须把与中国的合作作为重中之重。

我们必须提供什么？

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北部的西斯塔科学城（Kista Science City）是一个国际研究中心聚集地，索尼、IBM、英特尔、甲骨文以及其他竞争者均在此设有研究中心。人们之所以选择西斯塔——而不是圣彼得堡——作为科学城的据点，是因为那里大学院云集，可以提供坚强的后盾。

芬兰赫尔辛基的维基大学（Vikki University）是一个农业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它有强大的国际计划，其中包括与加拿大和俄罗斯合作的大型研究项目。该所大学有意按一种螺旋模式来继续推动合作项目，鼓励大学、企业和公共部门之间进行合作。

近年，赫尔辛基通过合并赫尔辛基经济学院（Helsinki School of Economics）、艺术设计学院（School of Art and Design）以及赫尔辛基技术大学（Helsink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三所高等院校，建成了阿

尔托创新大学 (Aalto Innovation University)。这三所大学专长的学科各异，合并使学生有机会参与覆盖面更广的课程，建立一个全新的专业知识背景。这是培育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相当重要的途径。阿尔托大学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学生在中国、芬兰以及世界各地均可参与同样的课程，而不论这个课程在上海还是在波罗的海举办，并且可以合作完成同一篇研究论文。这种模式是从源头开始支持和培育强有力的国际合作。爱沙尼亚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事实上，爱沙尼亚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基因研究与工程计划。它正致力于开发一个可以把药物发展推上新台阶的本国人口基因数据库，以成为该领域的领先者。人们可以在人类基因数据库进行登记，将其基因扫描到数据库中，以用于学术研究以及制药公司的新药测试。这是一项积极和独特的举措，也处于生物技术的前沿。

流动的社会：

推动公民的跨大陆流动是环波罗的海地区的制胜关键。这是对区域内的政府部门的一项挑战。这些“飞行”的人们需要能够携带家属迁移到新环境里并在那里教育子女、找到合口的食物和朋友。

该地区的相关项目包括：

芬兰—中国技术合作中心

中国从国外订购设施和技术时，通常都会选择从德国和美国引进设备和知识。因为这些订单实在是太大了，像芬兰和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家，中国往往不予考虑；所以该中心的角色，就是帮助当地的公司做好准备，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要约。

通过社会创新与服务，安置好流动工作人员，例如Jolly Dragon Association就提供了通过各种活动寻找朋友和同事并结识雇主的方式。

拉脱维亚视听集群发展中心 (Latvian Audiovisual Cluster Development) 主办亚洲电影节、举办交流活动并为电影专业人士组织大师班。

从长远来看，欧盟和中国面临着较以往更多的共同挑战，也因此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合作机会。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战略。欧洲人说“可持续性”，中国人说“和谐发展”，这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并无多大的差别。正如中国专家在BASAAR最近一次的工作会议中所说，要解决细节上分歧，最好的方法仅仅是“坐下来谈”。

刘庆峰，
安徽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尖端语音技术公司)
董事长

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2010年上半年，双方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2100亿美元，同比增长37%。欧盟是中国最大的高科技供应国。2009年，中国从欧盟进口了2,772项技术，交易额为64.3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进口技术的30%。双方进行了高层互访，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欧盟也是安徽省最大的出口市场。欧盟和安徽省之间的合作交流协助安徽省从简单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出口向技术和研究成果出口转型。例如，吉利汽车和江淮汽车已分别在意大利都灵成立了研发机构，他们的产品也已进入欧洲市场。讯飞曾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 (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合作开发中德语言沟通学术交流计划。

以下为目前针对安徽实施的政策和计划：

在合肥、芜湖和蚌埠建立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此，政府部门已对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项目和科技投资（例如家电和太阳能行业投资）给予了重点扶持。2008年以来，安徽省政府每年拨款1亿美元，用于支持新的风险投资项目以及为鼓励创新而向创意、创业人才提供奖励。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将推动产业的转移，充分利用城市带在地理位置、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

讯飞充分利用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带来的发展机遇，一个很好的典范。目前讯飞正在安徽省内建立一个语音技术产业全球基地。该公司是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和口语评测技术方面的国际领先企业。目前他们正在开发的项目之一是利用智能语音技术开发中文自学软件。中文语音合成技术可将任何中文语言文字合成为语音，而口语评测技术则引导中文自学者正确发音。讯飞的英语语音合成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



会议二: 城市可持续发展

主持: Ronald Hall, 欧洲委员会区域政策总司司长

郁鸿胜,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化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三角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土地使用和环境恶化息息相关:

- 该地区土地资源有限
- 土地转为工业用地的比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由于注重经济发展增长, 土地用途转换进程更加迅速。
- 土地使用未得到合理的整合。
- 与国家其他地区相比, 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少。每平方米土地上有近700人,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UNFAO) 规定的基本最低水平;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五分之一。
- 该地区缺少土地储备。
- 土地生产率很低。
- 严重的环境恶化, 包括:
 - 湿地面积减少
 - 土壤污染 - 常用杀虫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有毒重金属
 - 外来物种入侵 (例如水葫芦)
 - 地面沉降
 - 水质和酸雨
 - 拥挤、嘈杂、肮脏的城市生活空间

所有这些都对人和环境都不利。

根据“十二五”计划, 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促进经济由传统的资源型经济, 向知识型、网络型的高效可持续生态经济转化。为此, 长江三角洲的区域政策需要着力解决下列问题:

控制环境污染。为此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城市、农村、住宅、工业用地要更合理地分配, 以便与生态系统取得和谐的发展。

发展各种废弃物回收系统, 改善城市废水处理设施、建造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工业固体废物收集和处理系统、加强工业区环保措施以及水质保护措施, 以此提高环境质量。

郁鸿胜提出的政策建议:

- 努力实现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
- 将工业用地的单位经济产量提高30%, 将城市住宅用地限定在每人100平米, 农村住宅用地限定在每人150平米。
- 为土地和水的使用建立和实施定价机制、补偿措施、财政补贴、排放权贸易, 以鼓励更高效地水利用。这需要目前负责水资源的九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
- 协调省级和市级政府的条例和标准。
- 促进两省一市的合作。

GUILLAUME VUILLETE,
巴黎大区区域议会议员

巴黎大区的1200万居民占法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成的居民生活在巴黎周围人口非常密集的区域。百分之八十土地是森林和农田。巴黎大区以其在文化、体育和创新方面的活力而闻名。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保持其国际排名和竞争力——目前是欧洲GDP (5000亿欧元) 最高的地区, 全世界观光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另外, 还要解决社会福利分配问题 (尤其是在巴黎北部失业率高的地区) 以及交通拥堵和空气/噪音污染问题, 以维持其社会和地理凝聚力。

为迎接这些挑战, 2008年巴黎大区制定了名为巴黎大区发展战略 (SDRIF) 的总体规划。该项规划是2004年与该地区居民进行广泛和持续讨论 (包括公民参与) 以及2006年公民大会调查之后制定的。规划的侧重点是交通 (降低汽车使用率以及发展公共交通)、就业、住房、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问题。

巴黎大区每年拨款2亿欧元用于住房领域。鉴于该地区昂贵的房价, 住房成为一大难题。这意味着, 确保所有巴黎大区居民拥有住房, 目的不仅在保证社会平等, 也是为了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巴黎大区鼓励通过创新举措来建设低价的民众能负担得起的住房。

在欧盟的大都市发展计划和巴黎大区的《2007—2013巴黎大区运营计划》之间开展了地区合作。该计划由SDRIF设计, 并由巴黎大区运营计划实施。区域议会也是一个重要参与者。在7年时间内总共拨款7.24亿欧元, 共同筹资最大比率为50%。在该笔款项中, 1.51亿欧元用于区域发展, 5.35亿欧元拨给社会基金, 3.800万欧元拨给农村发展农业基金。

由于资金有限, 我们用一项新制度代替土地分区规划制度, 通过该制度识别资源匮乏的重点社区, 给予扶持。2008年7月, 我们为城市整合项目选出了10个实施的区域, 这些项目涉及与中小型企业合作开展的能源项目以及主题研究和创新。该地区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中期评估。由SDRIF设计并由巴黎大区实施的该计划, 被证明是城市发展的有效整合手段。

巴黎大区地区将继续致力于增加区域合作项目数量, 使其与外围地区保持联系, 工作重点是利用新技术、保证巴黎大区的粮食供应, 并且确保人民可以得到社会服务。

张锋
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执行理事、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上述机构成员的张锋建议，将城市群模式作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对江苏省十三个省辖市在过去七年内以及江苏省二十七县级市过去连续四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年度评估。江苏省和长江三角洲拥有大量密集居住的流动人口，对于环保、宜居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建设形成了挑战。

评估系统使用下列指标：

□ 一级指标是整体可持续发展程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潜能。

□ 二级指标：根据十五项独立指标（包括经济规模、经济效益、人口质量和城市发展状况等）对各地区（省和市）进行排名。

□ 三级指标：根据三十五项指标（包括人均GDP、GDP年度平均增长率、人均工业生产率、资金的利税率等）对各地区进行排名。

基于上述评估，上海排名第一，而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常州、宁波、扬州、南通、镇江、绍兴、湖州由于其居前列的排名、社会发展状况、良好的投资和创新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2006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发布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状况：目标—手段—创新》，并设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该地区转变的步伐飞快，经济产出很高，并且具有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也面临着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严重短缺，以及严重的污染问题，部分问题应归咎于过快的发展。为应对这些挑战，上海很早就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我们已经拥有“金山银山”，但尚缺“青山绿水”。该中心致力于利用清洁工业和可替代能源来建造低碳城市。上海世博会对促进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新协作机制十分重要，包括改善周边的排水系统和太湖水质的协作机制。数据显示，在整个地区内空气污染得到改善，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比例有所提高。

该地区设立了数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常州社会服务试点项目以及江阴改变社区结构的试点项目是其中成功的典范。

该地区未来工作重点是合作建造数字网络化、生态友好的和谐创新型城市。为此需建造信息管理系统；用数字系统将人和机构联系起来，以实现知识创造、储存和交换的优化；建立安全监督体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用低碳能源体系；建造清洁、舒适、紧凑的城市空间；鼓励体制和系统创新以及创意、灵活、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PETER RAMSDEN,
URBACT主题经理

URBACT是一个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欧洲交流和学习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在欧盟凝聚政策范围内制定城市发展的创新举措。该项目的核心理念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处理一系列的政策行动，并且想象力比金钱更为重要。

欧洲城市状况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别，原因在于欧洲较早开始和完成了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城市面临的挑战是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的问题。目前72%的欧洲人生活在城市当中。城市是生产、服务的中心以及最主要的知识中心，但也是滋生各种问题的温床。大部分碳排放来自城市；城市是接纳移民的地方，也是大量贫困者聚集之地。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是，伦敦内城九到十个区的GDP为欧洲平均水平的三倍，但是该地区有一半的儿童在被官方认定为处于贫困边缘的家庭中长大。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和感到羞耻的统计数字。我们要对城市进行彻底改造，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

上海的城市发展模式兼顾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但是在欧洲城市中制造业几乎已经绝迹。20世纪80年代，欧洲城市遭受了制造业崩溃所带来的创伤。在谢菲尔德（Sheffield）有10万人失去了工作—在四年时间内钢铁行业丧失了5万多个就业机会，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德国和法国的农村地区。之后这些城市努力恢复竞争力。此类城市多为典型的单一企业城镇（single company towns），主要依赖于一两个行业，如钢铁、煤炭、造船、铝和造纸。新的就业机会往往出现在这些城市以外位于高速公路交叉点的物流中心和商业园。这不仅为老式的制造业城市带来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城市内部发展造成的城市扩张也严重背离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其结果是造成城市居民的不满。在伦敦、利物浦和法国的部分地区发生了重大骚乱。为此，20世纪80年代城市决策者试图推行“涓滴”模式，但我们发现，穷人数量不会因为富人数量增加而有所减少。

欧洲与中国的另一差异在于城市形态（总体的城市结构）。我们的城市化程度更高，但是城市规模较小。欧洲不像中国这样有许多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我们只有两个超大型城市—巴黎和伦敦—但是我们的城市密度确实很高。

在“涓滴式”方法失败之后，欧洲政策制定者们发布了欧盟和国家级的计划。这些计划以及社会学家Manuel Castells的研究工作在关于城市问题新思路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欧盟城市试点计划在1994到1999年期间运行，并且通过第二期计划（Urban 2）得以延续，该第二期计划重点不在城市或大规模区域而在社区。

从这些试点项目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虽然经常会有人提出新的理念，但是由于没有知识自由传播机制来传播这些理念，所以人们无法了解它们。URBACT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创立的。对于中国、欧洲和英国来说，为避免闭门造车，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创建相互学习的网络很重要。

将城市试点项目的良好实践作为主流，普及到更大型的欧洲凝聚项目中（Urban Mainstreaming）。这使得小型项目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七十多个取得巨大成功的主流化项目仅耗资1,000万欧元。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得以实施，但是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在URBAN计划之下实现的实际整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导向性质以及具体实施大多停留在国家层级的局限性，而被削弱、丧失。以行业为导向的计划会导致各自为政。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导致对经济的过分关注和对环境的忽视。欧洲城市长期以来过分关注经济，而对社会发展（和环境）关注度不够。在实践中，只有通过统一的项目结构，采用整合的项目模式才能获得具有整体性的结果。这也意味着要同时应用社会基金和地区基金。

另一套计划则涉及城市政策的研究问题。欧洲空间规划观测网络（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 Observation Network, ESPON）是其中的一项计划。该网络的核心是一个名为NORDREGIO的组织，它是一个一流的研究中心。相关的投影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覆盖整个欧洲的大型网络。

“URBAN 审计”是试图更好地确定和理解城市地区重要问题的统计活动，审计后将出具《欧洲城市报告》(State of European Cities Report)。

Ramsden先生发言的下一部分是用图片说明，三个重要城市在其各自的制造业崩溃之后是如何彻底改造城市的。曾经作为世界最大港口的利物浦，利用其为披头士乐队故乡的优势，发起了一场文化复兴。资金涌入保罗·麦卡特尼的母校——利物浦表演艺术学院 (LIPA) 并建造了利物浦泰特美术馆 (Tate Gallery)。遭受内战、洪水和去工业化活动破坏和困扰的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 (Bilbao) 利用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建造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进行了彻底改造。这也是第一个设立社会创新园的城市，在园内有残疾人组装的电动车出租。位于瑞典南部的马尔默 (Malmö) 在主要的产业造船业崩溃后，将工业废弃用地转化成现代化的优质低碳生活空间。这些实例证明了良好城市政策取得的成功。但是，也应注意，即使创新的方式可以复制并产生类似的效果，简单地复制其他城市的方法——例如像毕尔巴鄂那样建造一个标志性博物馆——是不太可能取得同样成功的。

URBACT的工作是，怎样吸取这些由英雄人物在特殊地点创造的精彩事件的经验，予以提炼、精心设计，以便世界上每个城市都可加以运用，完善其城市政策。

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我们的“福利国家”制度大多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创建，在之后的六十年内未进行大的改造。而大多数其他现代组织系统的情况并非如此。手机生产公司意识到为了保持竞争力，它们需要比电信业其他市场领导者——如诺基亚——做得更好。但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不存在可比性，没有市场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其他激励措施，激励官员们进行创新以及更加迅速地传播创意。

这就是URBACT的使命。作为一个小型计划，它仅有7,000万欧元经费用于学习和行动。在一个典型的项目中，十个城市合作伙伴共同实施一个特定计划，例如关于如何创建现代化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如何在城市中推广使用电动车，如何使移民融入城市的计划。URBACT行动计划的方法具有很强的活力。城市利益相关人应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来，问题所涉之行动参与人都应被纳入决策程序，无论是政策的适用对象或制定者。项目启动时先对确凿的事实进行审视，然后回到指标和问题上来，试图理解利益相关者和其他行动参与人在每个环节的问题。这些项目正在以规模化方式开展——而不仅仅是一两个项目而已。2011年将实施400项行动计划。

URBACT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区域整合。迈克尔·帕金森 (Michael Parkinson) 曾经说在欧洲我们有21世纪的经济，20世纪的政府和19世纪的疆界。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拿上海来说，其发展范围已经超出过去的空间布局，城市通勤区域面积扩大，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在实际的疆域内组织工作，建立一级、两级或三级高效的治理结构呢？

目前有三个旨在寻找管理新思路的项目：

URBACT联合行动 (URBACT JOINING FORCES) ——在城市和地区层面管理交通、创新、社会融合、城市规划

URBACT EGTC项目——管理跨国境的欧洲城市

URBACT 欧洲可持续发展城市土地用途管理项目 (URBACT LU-MASEC) ——通过四个层级的方法重建废弃的工业用地。使城市空间尽可能紧凑，以减少城市扩张，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例如，埃姆舍 (Emscher) 公园，以前鲁尔区 (Ruhr) 钢铁煤田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如今是废弃工业用地新用途的典范。

JESSICA项目——整合金融的新方法。它是欧盟以区域基金为核心的公私合营手段。

横向和纵向整合是最大挑战之一。URBACT致力于创造一种斜对角的整合模式，将横向和纵向整合结合起来。

凝聚网络项目 (CONET) ——如何使各部门有效合作，管理处危机中的社区。

URBACT地区政府网络项目 (URBACT REGGOV) 涉及纵向协作，特别是管理部门和城市之间的合作。

NODUS项目——在城市地区层面上组织重建。

从URBACT得到的经验教训是：政府部门可以组织城市地区的创新活动，但是不能够对其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政府部门可以给创新提供灵感和方向，但是创意必须来自地方层面。上海是中国第一个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教育的城市。这对于未来而言是必要的举措，但是如何让其他城市学习上海的榜样呢？这类举措需要得到更高层级的奖励和扶持。这需要新能力和技能的建设以及实践。本位主义以及机构的官僚作风是巨大阻力，阻碍良好的新措施推广。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在产生问题的同一层级得到解决，对于环境污染问题而言尤其如此。

URBACT是个极佳的案例，投入较小，但却创造出了极高的附加价值，改变了项目模式。为创造真正的创新区域，需要在各个层级设立灵敏迅速的治理机制。

当我们在谈论如何实现明智、包容的可持续增长时，不要忘记治理的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闭幕式

RONALD HALL, 欧洲委员会区域政策总司司长

RONALD HALL先生针对预期“十二五”计划会提出的四个重点问题，来思考中欧之间的合作关系。他说双方确实存在许多共同点，不仅是过去一段时间，在未来也将如此。

为鼓励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化，GDP中工资所占比例应增加，而投资比例相应减少。这与欧盟形成有趣的对比：盟经济的问题是过度注重消费而对投资重视不够。但是由于目前严峻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目前无法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 适度的增长战略（与过去几年高增长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定义的适度增长率（每年7%）对于欧洲来说仍然是望尘莫及的，但是增长也是欧盟的一项工作重点。欧洲2020战略强调对普罗旺斯和蓝色海岸地区类型的增长中心的需求，以及对教育的日益重视，特别是高端教育。

□ 政治和税务改革。两个问题同样都与欧洲有关。政治改革关系到我们如何解释今天所介绍的波罗的海、长江三角洲、巴黎和整个欧盟的区域凝聚力。如果在欧盟层面提出税务改革，欧盟将说好吧我们需要一些改革。这将改变欧盟预算依赖成员国缴款的局面。欧盟和中国之间最大的差异之一是，欧盟不对其公民征税。

□ 气候变化。在这一领域欧盟和中国有太多共同的工作重点，这一点再明显不过。现行的欧洲战略是在2020年之前实现“20—20—20”的目标，即可再生能源比例在总能源中达到20%，能源效率提高20%，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

最后，Hall先生提到欧盟和中国的合作领域正在不断扩大。有许多工作重点需要在地区层面采取行动，不是能够在国家层面解决的。例如，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多地区和多国共同解决，因为气候问题存在空间差异性——不同地区的能源效率、排放量差异很大。处理这些问题需要的组织形式，与以传统国家政策为特色的组织形式不同，并且是一个有趣和重要的合作领域。

邹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
区经济司副司长

本次会谈内容丰富，取得了很大成功。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它是“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而金融危机和环境挑战的出现也使今年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本身并不是新理念，但是具有新的意义。中国的工作重点是致力于地区工作重点，即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共服务系统，以及缩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前面一个发言者谈到今天的问题不能用过去的方法解决，对此我们深表赞同。我们应当针对新问题找出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 中国 欧盟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

